

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 和国家联盟

卡尔·考茨基著

(供内部参考)

D143

26

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 和国家联盟

卡尔·考茨基著

何疆、王禹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K. Kautsky
Nationalstaat, Imperialistischer
Staat und Staatenbund
Fränkischen Verlagsanstalt & Buchdruckerei
G. m. b. H.
Nürnberg 1915

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

卡尔·考茨基著

何疆、王禹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1963年2月第1版

1964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3002·81 定价(七)0.40元

印数1,001—3,000

出版者說明

这是考茨基在1915年2月写的一本小册子。考茨基那时已經彻底堕落成为馬克思主义的叛徒，他在这前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小册子中，大肆为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殖民政策辯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背叛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場辯护，宣揚他的所謂“超帝国主义”理論（帝国主义各国可以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国际組織，这个世界托拉斯組織將能消除各国間的冲突、战争和軍备竞赛，生产无政府状态和經濟危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就是其中比較著名的一本。

考茨基在这本小册子里把資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民族国家（第1章）；第二阶段是帝国主义国家（第2—5章）；第三阶段是国家联盟（第6章）。其中論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战争的根源和实现持久和平的办法，資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和途徑，民主和专政，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和策略等等。

考茨基认为，当前的世界大战不是純粹的帝国主义战争，它“是在不存在任何帝国主义爭端的时候爆发的”。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資本主义的产物，它体现在工业国征服和兼并越来越多的农业地区的要求中，但殖民政策本身，“从其最重要的現象来看，不是以帝国主义为根源的”。战争的产生是由于資本主义經濟的进一步发展“在民族国家的範圍內已不再可能了”，它的最主要的根源是“軍备竞赛”。世界上一切帝国主义爭端都是可以用和平协商的方式来消除的。取得持久和平的最好方法是实现国际社会主义的四条和平綱領，即：1. 反对任何暴力兼并，实现民主；2. 裁减軍备；3. 簽訂貿易协定；4. 尽量降低关税。这个綱領“是从整个无产阶级运动长远的和共

同的需要以及从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的”，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坚定不移地为实现这个纲领而奋斗。资本主义还有进一步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发展的途径“最好不用帝国主义的暴力方法，而用和平民主的方法”把“各个具有同等权利的国家联合成国家联盟”，国家联盟是“资本主义赖以达到其最后的、最高级的形态所需要的”，它形式多样，伸缩性强，前途远大，“最终可以一直发展到世界联盟”，而无产阶级则将在这个阶段上夺得权力，这对劳动群众来说，是一条牺牲最少、痛苦最小的道路。

这本小册子出版后不久，列宁就在《第二国际的破产》和以后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两文中对其中的主要谬论进行了驳斥。列宁指出：“考茨基拿着对资本主义的和平新纪元的希望，来替机会主义者和正式的社会民主党违背巴塞尔决议的庄严声明而在目前风暴时期倒向资产阶级和放弃革命策略（即无产阶级策略）的行为作辩护！”他“要想从各国资本联合成为统一的国际整体的事实中，得出裁减军备的经济趋势的结论，就等于用小市民希望阶级矛盾和缓的善良愿望来代替阶级矛盾的真正尖锐化”；“聪明绝顶的考茨基为了安慰工人，为了使他们跟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妥协，就把一条链子上的这一环节同另一环节割开，……考茨基不提帝国主义和平时期同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之间的活生生的联系，而把僵死的抽象概念讲给工人听，是为了使工人同他们那些僵死的领袖妥协”。列宁指出考茨基是在执行为压迫阶级效劳的牧师的职能，“当争夺强国特权的武装斗争已成为事实的时候，考茨基就来劝导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说，战争是可怕的东西，裁减军备才是好事。这样做和这样做的结果完全像基督教的牧师从讲台上劝导资本家说，博爱 是上帝的教诲，是灵魂的所向，是文明的道德规范。考茨基称为导致‘超帝国主义’的经济趋势的那些东西，实际正是小资产阶级劝导金融资本家不要为非作歹的忠言”。这位“牧师劝导资本家采用和平民主的办法，并且说这是辩证法”；这位“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从

而使他們忍受这种統治，使他們放棄革命行动，冲淡他們的革命热情，破坏他們的革命决心”。在这本小册子里，“考茨基把馬克思主义歪曲成了最恶劣最笨拙的反革命理論，歪曲成了最齷齪的僧侶主义”。（參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200—209 頁和第 22 卷第 281—291 頁）

本书是根据德国紐倫堡弗兰克印刷公司 1915 年德文版譯出的。

目 次

一	关于民主和关于民族国家的若干问题.....	1
二	帝国主义国家的必然性.....	11
三	国家扩张要求的原因.....	19
四	帝国主义的各种类型和目标.....	34
	甲 不列颠国家联盟.....	34
	乙 东印度.....	40
	丙 非洲.....	48
	丁 中国.....	54
	戊 土耳其.....	57
	己 世界大战.....	64
五	贸易协定.....	70
六	关税同盟和国家联盟.....	76

一 关于民主和关于民族 国家的若干問題

很不幸，这样的时期再一次地又来到了；即为了阐述明白起见，必須从最基本的东西讲起。有一些同志认为，我們迄今为止所知道的一切，現在已經证明是騙人的玩意儿，或者已經过了时，只符合那种不再存在的情况，現在只能作为“自由主义的遗产”而属于“古董仓库”里的东西了。

帝国議會党团 8 月 4 日声明中所宣布的关于“每一个民族都有民族独立的权利”的原则，也被說成是这种过了时的观念之一。

这个原则現在遭到党内同志的攻击。关于这个原则，我們必須弄清楚；它在行将到来的和平談判中将起巨大的作用。

溫尼希同志在 12 月 8 日凱姆尼茨《人民呼声报》的一篇文章中說：这个原则不是“社会主义固有的原则，同其他某些东西那样它是工人运动从十九世紀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精神武庫中接收过来的”。他还认为，这种要求同科学社会主义毫不相干。

“社会主义既不能把划分目前的疆域当作世界政治现状的基础，也不能把每个民族要求彻底独立的绝对权利当作世界政治现状的基础。只要社会主义能够影响战后的新秩序，那末社会主义在这里，正如在其他各处一样，也必須根据总的发展趋势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来确定其计划的方針路綫。

但是在今天，国家制度毫无疑问地是朝着大国的方向发展的。”

溫尼希沒有說明，我們根据“总的发展趋势”想要建立的这种大国应该是怎么样的国家，但是显而易见，这該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国家。

这种看法在右派以及在左派那里，在卡尔斯魯厄以及在哈勒都

博得喝采。卡尔斯魯厄《人民之友报》以贊同的态度轉載了哈勒《人民报》的一篇文章。其中包括这样一段：

“拉薩尔在他的关于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小册子里說，如果没有独立的民族国家，就不可能有民主。为什么不可能，这却无法看出来。为什么像德意志帝国——其中除了德意志本族人之外还有波兰人、丹麦人、法兰西人——这样一个国家就不能加以民主管理？即使一千二百万德意志—奥地利人不参加进来，为什么目前不是清一色民族組成的德意志帝国就不能成为民主国家？今天使得全国公民完全平等的民主制度未能实现的，不是民族差别和矛盾，而是阶级差别。”

这位哈勒方面的作者还认为，拉薩尔 1859 年的看法并不因而就是荒謬的。这种看法当时是有理由的，因为德国和意大利在当时都需要建立统一的国家。但是，从那以后，资本主义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也大大地提高了：

“其发展規模是如此巨大，以致于对资本主义說来民族国家的范围已变得太狹窄了。多年来，国家的追求世界大国地位，一直是政策的巨大动力。这就是說，每一个大国都力求越出它的国界向外扩张，必須向外扩张，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进一步扩大已不再可能了。”

在最后一句話里，作者显然忘記在“已不再可能”这几个字前面加上“在迄今为止的国境之内”或“在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等字样，不加上这些字，結論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所有这些言論都包含了許多正确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把其中隱藏着的重大謬誤之处不留神地一并接受过来的危險也就越大，而這些謬誤之处可能給我們的宣傳造成严重的損失。

为了把它們揭示出来，我們必須进一步地回溯一些来由，并且首先来討論一下民主的实质。

民主的历史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人类最初的組織就是群体；这些群体有时根据傳統和习惯，有时通过自由选出的有經驗的領袖作出的决定，有时依照聚会的群体成員所通过的決議来管理其事务。

不言而喻，所有群体成員都能互相交談，都說同一种語言。有时某些从战争中俘虏来的妇女說另一种語言，然而她們却恰恰并不构成民主的成份。民主所及的范围也就是共同語言所及的范围。这就是說，所有在同一个民主公社里的人都說同一种語言。但是反过来，并不是所有說同一种語言的人都联合在一个公社里。后面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絕大部分是不存在的。

当閱讀和书写还不曾发明，不曾被群众所掌握，而且交通工具还不发达的时候，民主只能通过口头的交談来实现。这样就給各个民主公社的地域和人口划定了它們所无法逾越的界限。人民大会是最高一級的民主；公社的地域不能扩大到其成員无法經常参加人民大会的那些地方。另一方面，公社的人口也不能多得使某一部分成員无法参与議事的程度。因此最初的民主是越不出村社和城邦的范围的。

在这个阶段上，一个較大国家的形成，一般說来只能通过这样的途徑：即一个特別强大或条件优越的公社——可能是一个部落或一个巩固的城邦——征服了另外一些部落或公社并使它們納貢，但同时被征服者一般說来仍然保持自己管理一切内部事务的权利。公社的民主就可能如此地成为国家里专制主义的基础，正像东方今天还往往存在的情况那样。恩格斯早就指出过，俄罗斯的专制主义是立足于村社民主的基础之上的。

由于每一个公社都繼續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因此联合在一个国家里的各个公社也就沒有必要都說同样的語言。只須每个公社里有一两个代表懂得統治者的語言就够了。在各个民主組織的范围内流行着共同的語言。把它們統一在一起的专制制度扩展到各种不同語言的地区。因此在这个阶段上，一个国家的擴張只受到居統治地位的公社的力量的限制。但是它并非沒有任何其他的联系手段。唯有居統治地位的公社的作战力量才构成国家，而国家又能凭借这种力量来迅速地大举擴張。一旦这种力量消失，那么这个国家也許就会迅速瓦解。甚至在近代，我們还可以看到这类国家擴張的实例。俄国从十七世紀以来之迅速向东西伸展，以及英国在十八世紀之迅

速取得大部分东印度，如果不是这样一种公社的原始民主在这里和在那里还居统治地位的话，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种原始民主之上，有一种作为国家组成因素的军事强制统治高高地居于支配地位。俄国的面积从而变得等于欧洲的两倍以上；不列颠帝国主要也是由于印度，才能使它的人口几乎与欧洲相等。欧洲有四亿四千三百万人口，不列颠帝国大约有四亿一千八百万人口，其中四分之三在东印度。俄国大约包括一百五十个民族，印度语言的种类则比这还多。

然而在这两个庞大的帝国形成的同时，已经产生了越出公社或村社的领域而在一个较大的国家内实行民主从而用现代民主来替代原始民主的物质条件。这是由于交通事业和印刷事业的发展以及阅读和书写的普及化而实现的。现在已经产生了一种对懂得同样语言的一切人毋须发生个人接触而讲话的手段。在同书面方式，尤其是印刷方式相比之下，口头方式的相互沟通的意义越来越小了。不仅对于少数受过教育的上层分子，而且对于运用同样语言的全体群众来说，现在已经形成一种紧密的精神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又进而凭借共同的书面语言而使复杂的方言退居次要地位，从而使得使用共同语言的共同体的扩大和紧密方面又有进展。同时，拥有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和固定的关卡疆界的现代大国也形成了。它首先加强了国家中央权力机关的权力，这种权力成为一种绝对的权力。但是由于交通事业和新闻事业的发展，全国的居民越来越能够了解中央权力机关作什么和不作什么，对之加以讨论和批评。同时，对于每个人来说，中央权力机关的这种行为也越来越变得重要起来，国家权力的范围也扩展了。因而迫切要求通过由群众选举产生并受群众监督的议员和代表制度对中央权力机关的行为施加影响。这样就发展出现代民主制度，它的主要特点是议会制度、新闻事业以及遍及国家整个领域的巨大的政党组织。对这些制度进行批评，这是再容易也没有的事了；而要在现代民主中把这些制度剔除出去，则又再没有比这更不可能的了。尤其是议会制度，不断地遭受风暴的打击，而且自从有这种风暴以来，就一直有这种不断被人重复的断言：议会制度已经

过时了，應該代之以一种更加完美的民主制度。但是如果仔細考察一下，这种代替物总是表现为一种原始民主形式。这一点也适用于由人民直接制定法律以及它的更加烈性的变种——群众性的罢工。这两种形式虽然能够發揮意义重大的历史作用，但是只能作为議會制度的补充，或者在議會制度一旦发生故障时作为其促进力量；然而它不能代替議會制度。議會制度的最坚决反对者——无政府主义者也彻底到甚至願意重新恢复公社制度，使国家变成一群主权公社，以便摆脱議會制度。他們由此而十分明显地表明，那种想把代議制排斥在外的民主是何等原始，他們的打算是何等反动。

正如一切社会活动一样，政治的官能是語言。只有当我掌握我的党的語言时，我才能对我的党发生影响；我愈是熟练地掌握其語言，我就——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愈加能够对它發揮影响。如果一个国家里說着不同的語言，那末一位政治家、一家报纸、一个政党几乎不可能对全体人民讲话，而只能对一小部分人讲话。甚至像社会民主党这样的国际性政党在奥地利因而就分裂成了不同的党組織，它們彼此之間无法了解，其中每个組織只能对整个国家里的一部分无产阶级发生影响。

我們在哈勒的党組織的这位工作人員問道，为什么拥有波兰人、丹麦人、法兰西人的德国不能实现人人的充分民主。但是一位波兰政治家，或者一家波兰杂志，或者一本波兰书籍，無論用波兰語言向我們說得如何娓娓动人，令人信服并且含义丰富，它們也許会对德国境外的波兰人发生影响，但是决不能对德国人民发生影响。民主的实质毕竟是存在于对人民的影响以及通过人民所發揮的影响之中的。

在一个拥有統一民族的民主国家里，一切政治家和政党只有这样一个可能性来扩大他們对国家的影响，即通过在人民中間宣傳他們的主張，通过这种主張爭取拥护者。在多民族国家里，任何人不能对全体人民发生影响，而且在数目有限的讲同一語言的居民中間进行宣傳时，任何人都会发现有一个限度。这种居民人数愈多，他的宣傳就愈有前途，他在国家里的权力也就愈大。所以，在多民族国家

里，由于民主的发展以及各党竞相宣傳其主張的斗争，不同民族的各个政党組織彼此都努力(尤其是通过相应的学校組織)在全国居民中影响其本民族的——也即其語言共同体中尽量多的人。由于一个国家内部諸民族之間的斗争，民主就遭到了窜改和支解，并且在与国家中央权力机关相形之下受到了削弱。

这里还要考察民主的另一方面。民主不仅意味着由人民来掌握国家权力，而且意味着每个个人在国家权力面前的平等。这种平等在多民族国家里也受到了侵犯。每个現代国家都需要統一的行政，因而为此也需要統一的語言。沒有一个現代国家沒有一种至少必須为高級政府机关所理解和掌握的国語。美国包括許多民族，它甚至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然而它有統一的国語——英語。甚至由于共戴一君制而在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联合起来的两个多民族国家，都各有其国語——匈牙利的国語是馬札尔語，奧地利的国語实际上是德語。仅仅有不完善的国語，对于这个国家來說不是很有利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一个小国可以有两种官方語言。一个国家里有多种国語，这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显而易见，一个国家的語言的多样性将严重影响民主和平等。在这种国家里，会讲国語的人常常比不会讲国語的人有利得多。如果法官和律师不懂得被告的語言，那末被告的处境是很不利的；一个学生如果只能很吃力地勉强說說在听課和应考时所使用的語言，他的处境也是十分不利的。一个官員不能掌握政府机关所用的語言，就会被免职。議會里的一个发言者如果說一种他并不精通的語言，或者說一种只为一小部分在場的人能听懂的語言，他的作用就会受到严重影响。作为国家里的个别的外族人，他不得不忍受这种情况。作为国家里的一个强大民族的成員，他就会对于个人由于民族原因而受到的歧視表示愤怒。民主的感受愈强烈，那末要爭取他的民族在国家里享有平等地位的要求也就愈强烈，于是，民族反对派就会同国家的生存条件越来越发生矛盾。

但是階級斗争將由于民族之間的这种敌对而受到削弱。如果一

个民族在国家里受到另一个民族的侵害，那末这个被压迫民族的各个阶级在压迫者面前就十分容易团结起来。阶级矛盾就会被抹煞或者被窜改，根本不表现出来，或者以一种被歪曲的方式表现出来。同一个阶级的成员之间的团结，尤其是被剥削阶级的成员之间的团结就会受到影响，被剥削阶级的阶级感情大多本来就不像剥削者那样形于外的。

这一切困难在全国所有人民群众都讲同一种语言的地方，即在民族国家里，是可以避免的。在那种在现代民主制度产生以前就已经形成的旧的多民族国家里，这些困难将由于居民的习惯和适应性而有所减弱，这种居民还没有体验过民族国家的好处。这些困难也会变得完全无法容忍，如果用强力把这样一种异族分子并入一个国家的話：这些异族分子已经使现代民主制度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要建立民族国家的努力，是与那种要建立现代大民主制度的努力同时出现的，而且是与它十分密切地联系着的。那种认为奥地利只要有民主就能够生存的看法，是再荒谬不过的了。使奥地利复兴的一切民主尝试，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这样一个想法出发的：即想使这个统一的国家变成民族国家的联盟。这也就是俄国边疆地区各民族所要求的民族自治。在每个这样的民族国家里，才可能有完全的、不单单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和有效的民主。

社会民主党从资产阶级民主中间接受了争取建立民族国家的要求。当然，我们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但是我们与资产阶级民主派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我们认为民主似乎是什么微不足道或者完全多余的东西。无产阶级作为国家里最低层的阶级，除了通过民主之外根本没有其他的方法来取得自己的权利。我们只是没有这样一种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似乎一旦争取到民主，无产阶级仿佛就已经取得了它的权利。这只是无产阶级据以争取自己的权利的一种基础。无产阶级并不在民主制度下停止解放斗争，而只是采取其他的斗争形式。

恰恰是对无产阶级来说，而不是对资产阶级来说，民主是生存的一种必要条件。资产阶级抛棄了目前高度的民主理想，从而也抛棄了

民族国家的观念。资产阶级今天对国家理想的追求已经越出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他们把这种“自由主义的遗产”抛进了“古董仓库”。但是这确实不能成为我们也这样做的理由。我们不应该这样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即认为既然资产阶级“总的发展趋势”是由经济条件决定的，因此无产阶级必须接受这种趋势。无产阶级有它自己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同样也是由经济条件决定的；无产阶级必须遵循这种趋势，不管这种趋势是否与资产阶级的趋势不同，或者与它根本相反。

当然，以上所谈到的只是人们必须理解并且必须有意識地遵循的趋势，不是绝对的死公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而有些人对千篇一律地运用这个公式提出了批评，但他们却认为这种趋势已经证明是错误的。温尼希和哈勒的那位同志就是这样做的。

首先，不能把争取建立民族国家的要求理解为一种要把讲同样语言的一切人全部组成一个共同国家的绝对义务。民族国家的观念只是说：如果在国家里全体人民群众都说同样的语言，那末民主就能最美滿地发扬和最完美地实现。在这个国家之外，也完全可以建立另外一个讲同一种语言的国家。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违背了民主的要求呢？如果在美国，英语是国语，在巴西，葡萄牙语是国语，在南美其他国家，西班牙语是国语的话，那末谁也不会把这些国家与英国、葡萄牙、西班牙的分离看成是违反民族性原则或违反民主。

诚然，建立民族国家的努力，往往与那种把所有讲同一语言的人结合在一个特殊的国家机体中的努力具有同样的意义。这只有对这样的地区才是可能的：在这些地区里住着聚集在一起的同一民族的群众，而且彼此互相接壤。

在这种条件下，民族统一要求的产生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即首要的因素，是使民族国家尽量龐大和强盛的愿望，这种愿望大致上和民主相符，除非这种强盛用于对别国施加暴力，而不是用于保卫自身以防止外国施加暴力。其次是一种由于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商品交流而产生的要取消任何小国林立状态、取消国内关卡和争取统一的商业条件——货币和法典——的愿望。这些因素中的第三个因

素是一种在下层群众中間尤其活跃的动力：即如果在民族的邻近地区內他們同一民族的人受到很不平等的对待，或者甚至遭受虐待的話。民主的感受和民主的团結心愈强烈，那末要使同民族的人获得解放的要求也就愈加强烈。

似乎如果由馬札尔人完全統治奥地利，在維也納国会里只許讲匈牙利語，在学校和大学里只用匈牙利語讲课，国家官吏都必須人人精通匈牙利語，那末我們这位哈勒的同志也許才会不那么强烈地駁斥“瓦解奥地利，以便使那里的一千二百万德意志人歸屬德国”。那时，他也許才会懂得，民主与民族独立之間有多大的关系。

針对温尼希想要借此嘲笑爭取建立民族国家的努力的那种企图，还必須提到另外一点：即他把这种努力看成是單純的死公式，看成“絕對的权利”。語言是人与人之间交往和联系的工具，但不是唯一的工具。讲不同語言的人也能互相交往，只要通过譯員就行了。每个国家之內都形成經濟的、親屬的、政治的关系，这些关系在一定情况下可以比語言共同体的联結更加紧密。現代大国中沒有一个是一举而建成民族国家的，其中每一个都是多民族国家，而且大多数至少还帶有从不同的民族建立起来的痕迹。在历史上的国家里的不同民族集团之間因而在这方面和那方面形成了紧密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解除可能是令人痛苦的，甚至簡直可能引起經濟和政治的退化，如果这种关系的解除是采取征服的方式强行实现的話。如果有誰想簡單地把欧洲語言分布图拿来并且按照这个分布图来实现我們这个大洲的重建，那末他在有些地区将遭到强有力的反抗。我們不妨回忆一下亚尔薩斯人在 1871 年何等强烈地对于歸屬德国表示抗議，而亚尔薩斯人对德語的熟悉程度是超过法語的。讲法語的瑞士人不願意成为法国人，而願意同讲德語的瑞士人繼續結合在一起。此外，还有些意大利人害怕，的里雅斯特在摆脱奥地利統治之后会陷入經濟衰落等等。

如果我們承认这些情况，那末民族性原則还有什么意义呢？温尼希认为，于是我們只能維持現狀，而現狀却又同民族性原則一样地无法持久。

“人們也許會反对說，民族权利原則應該这样地去理解：即不使今天的国家划分有任何改变，首先德国和奥地利不应把任何異族居民和外語居民吸收入它們的国家組合之中。但是这除了意味着把人所共知的現狀提高到社会主义世界政治体系之外，不能再意味着任何其他东西……并且除此之外还意味着拒絕一切将来的发展，使目前的疆界永久化”。

自然，現狀并不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界政治体系。另一方面，我們并不要求无条件地一定要实行民族国家的主張，并且把不符合这个主張的一切現有疆界全部改变。单单这一点就可以使溫尼希和我們那位哈勒的同志对此放心：我們并不要求使大国瓦解为无数个小民族国家。关于这一点我們以后还会看到，有办法使小的民族国家合并成較大的共同体。

我們根本不是对現狀感兴趣，而恰恰是对于如何改变現狀的方式感兴趣。

民主制度以及与它密切相关联的民族国家观念要求：非經有关居民的同意，不得改变現狀。它还要求：任何国家都不能单单根据征服权而把那些反对改变的居民兼并进来。沒有人能像社会民主党那样地坚决反对現狀。但是也沒有人会像社会民主党那样坚决地拒絕那种作为改变現狀方法的征服权。如果我們站在这样的立場上，那末我們所同意的改变現狀只能显得是进一步接近民族国家的观念，而不是又去違反这个观念。

如果这次战争把目前基本上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德国变成一个多民族国家，也就是如果德国的非德民族的成份更加扩大，那末德国人民的遭遇就再不幸也沒有了。那些希望有这种結局的人，还从来沒有一个多民族国家里有过亲身經歷，所以不知道多民族国家会如何歪曲和压制民主。

但是我們豈不因而違抗了經濟必要性嗎？难道經濟必要性不是迫使現代国家“超越它們的疆界而向外擴張，因为否則的話生产力的进一步扩大就不再可能了”嗎？